

# AI演员热潮下影视创作如何坚守「人」的价值

■文许蕾 徐智鹏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数字建模技术的持续发展, AI演员正逐步进入影视创作实践并引发行业关注。近期,国内公司签约 AI数字艺人并推出由其主演的剧集,标志着相关技术开始由探索走向应用;与此同时,海外市场围绕 AI演员的争议亦在持续发酵, AI角色进入经纪体系的尝试引发行业组织与从业者的广泛讨论。

在这一背景下,如何正视 AI演员在提升制作效率、拓展表达方式等方面的巨大潜力,思辨 AI演员在审美体验、创作机制及行业规范等方面的全新挑战,将 AI飞速发展引发的“焦虑”转化成引导行业正向发展的“动能”,成为当前影视行业亟须回应的重要课题。

## AI演员为影视创作注入新的技术动能与产业价值

从产业实践角度观察, AI演员的引入为影视创作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在生产效率与表达方式上释放出巨大的产业潜力。

首先, AI演员在生产环节中实现了明显的降本增效。在替身拍摄、后期补拍及复杂场景制作中,数字角色和 AI生成技术可以有效减少重复拍摄与现场调度成本,使制作流程更加灵活可控。在影视剧后期通过数字替换完成镜头修复,在广告制作中压缩真人拍摄周期,以及在短剧生产中通过 AI角色实现快速生成与迭代,均体现出 AI在降低成本、提升效率方面的实际应用价值。

其次, AI演员也推动影视创作向“倍速生产、极速迭代”方向演进。短剧领域的探索尤为明显,部分项目通过固定数字角色实现批量化内容生产,呈现出较强的可复用性。网文传媒推出 AI剧集《秦岭青桐诡事录》,并签约 AI演员参与持续创作,也体现出行业在虚拟演员常态化使用方面的进一步尝试。

不但如此, AI演员也在不断拓展影像表达的想象空间。技术突破了传统拍摄的物理限制,使科幻、神话及跨时空叙事中的非现实角色得以更为自由地呈现。通过数字角色建模与 AI辅助表演,高难度动作场景和复杂视觉效果可以在更可控的条件下,以更高效的方式完成,从而为创作者提供更突破性的表达手段,将影视作品的题材疆界拓宽至无限。

此外, AI演员的数字形象正在拓宽影视内容的跨媒介传播空间。虚拟角色不仅服务于影视作品本身,还不断向游戏、虚拟演出及品牌营销延展。数字人已广泛应用于直播、电商与内容平台,通过持续运营形成稳定的用户连接。部分项目还尝试以虚拟角色为核心进行 IP开发、虚拟偶像运营,实现影视、互动内容与商业场景的联动。 AI演员在增强用户互动体验的同时,也展现出在文化传播与商业转化中的潜力。

## 技术快速渗透引发创作生态与伦理层面的多重隐忧

AI演员为影视创作带来效率提升与表达拓展的同时,也需要注意到,技术的快速渗透正对创作生态与行业规范产生深层影响。一些在实践中逐渐凸显的问题,已从个案层面延伸至更为普遍的行业现象,亟需进行系统性审视与前瞻性规制。

首先, AI演员的大批量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表演的程式化倾向。基于数据训练生成的表演虽然在形式上趋近真实,但其情感表达往往依赖既有样本的组合与模拟,难以呈现人类演员在具体情境中的细微变化与即时反应。一些 AI生成的表演片段被观众评价为“表情僵化”“缺乏情绪递进”,使用数字替身完成的表演也引发了关于“演技真实性”的讨论。可复制的表演模式,可能在无形中削弱观众的代入感与共情体验。

其次,算法驱动的内容生产机制正在强化同质化表达并加速“创作茧房”的形成。在短视频与短剧平台中,基于数据反馈的内容优化逻辑使创作者更倾向于沿用已有的成功模板,顺应观众偏好,进而形成题材、人物设定及叙事结构的趋同。一些 AI短剧在角色外形与故事框架上呈现出高度相似的特征,甚至出现“批量生成”“快速复制”的生产模式。算法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向驯化创作,进而窄化审美,压缩原创表达空间。

与此同时, AI演员的广泛应用还带来了日益突出的权属与伦理问题。 AI换脸、数字复刻等技术在未经充分授权的情况下使用现实演员形象,已在部分短剧与网络内容中引发争议,个别作品因角色形象“撞脸”知名演员而受到质疑。海外市场亦出现类似情况, 2025年9月,英国公司打造的 AI角色蒂莉·诺伍德宣布签约好莱坞经纪公司,引发行业热议。美国演员工会发表声明提出质疑,演员艾米莉·布朗特等从业者亦公开表达担忧,多家经纪机构明确表示不会参与相关合作。这一现象表明, AI演员在加速进入产业链的过程中,已触及创作伦理与行业规则的敏感边界,在肖像权、表演权及数据使用权等方面,当前仍存在界定不清的问题,亟待引导规范。

从更深层次看, AI演员的普及还可能对影视创作的人文价值产生影响。当表演逐渐被视为可被技术替代的生产环节,演员作为“不可复制的此在”面临被抹除的风险。这种风险并非简单的岗位替代,而是创作逻辑的迁移:从“体验—表达”转向“数据—优化”。一方面,部分制作环节对数字替身的依赖,正在改变传统用工结构;另一方面,过度依赖技术生成内容,也可能使创作从对人类经验与情感的表达,转向对既有数据的再加工。当算法以完播率、情感曲线为训练目标,情感本身被降格为可计算的情绪参数,那些“冗余的”“反效率的”审美时刻将系统性流失。这种“去人化”倾向若缺乏引导,影视艺术或将从“认识世界的窗口”退化为“确认自我的镜面”,可能对影视艺术的正向发展带来严重影响。

## 探索技术与人文协同共生的未来实践路径

应对 AI演员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关键在于以“人文定锚、制度划界、技术赋能”为原则,在技术发展、人文价值与行业规范之间建立可执行的动态平衡机制,引导其在合理边界内服务于影视创作。

价值导向层面,应将审美判断贯穿于 AI影视创作全过程,确立创作者在影视生产中的主体地位,避免技术对内容的同质化塑形。如一些影视项目在使用数字替身或角色复现技术时,通过人工调校表演细节与情绪节奏,以保证最终呈现符合创作意图;也有创作者通过对 AI生成内容进行二次加工与风格调整,使技术成果服务于整体表达。此外,需要通过审美引导强化创作者对 AI技术的主动把握能力,未来的创作者不但应该了解 AI技术,更应主动使用 AI技术,更好地影视叙事服务,确保影视作品在情感表达与叙事层面的深度与个性。

制度保障层面,应加快完善制度体系建设,着力构建真人演员与 AI演员共存、共创的良性工作环境。一方面,应通过明确授权机制、收益分配方式及使用范围界定,保障真人演员在数字化使用过程中的知情权与收益权,避免其形象与表演被无序替代;另一方面,应为 AI演员的使用建立透明、可追溯的技术与管理规范,使其在既定边界内作为创作工具参与生产;此外,行业机构或主管部门应引导、协助真人演员完成 AI时代的创作转型与任务升级,既维护从业者权益,又释放技术潜能,从而为多主体参与的创作格局提供安全、稳定的运行基础。

长远发展来看,更应推动人机关系由“替代”走向“协同”,并将其确立为影视行业应对技术变革的基本发展方向。通过流程优化与分工重构,将 AI技术嵌入标准化生产体系之中,使 AI演员与真人演员在分工清晰、关系稳定的框架中实现良性互动,既使其在技术执行层面发挥优势,同时将关键的创意判断与表达控制权牢牢掌握在创作者手中,避免替代逻辑对行业结构的冲击,促进影视行业对 AI技术由“可用”走向“善用”。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与会代表委员提出“秉持文艺初心,坚守人民立场”。 AI时代下如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已经成为新时代的集体呼声。衡量 AI演员价值的根本尺度,不应只是“像不像人”的技术问题,更在于能否书写人民、反映现实、回应时代,体现影视创作的“人民性”。

(许蕾,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2025级艺术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徐智鹏,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

# 「赛博格明星」: AI演员的文化实践及其「怪怖」焦虑

■文王彬

模式上,胶片电影建立了影像与现实索引性关系,计算机成像数字技术则使影像摆脱了对现实物质世界的依赖。如果说动作捕捉的数字表演作为技术中介下演员肉身数据的如实记录与生动转译,还维持着数字索引性的痕迹,那么随后基于生成式对抗网络(GAN)的深度伪造技术、潜在扩散模型(LDM)的引入,使 AI生成虚拟演员得以全然取代作为碳基生命的真人演员,逐步切断了这种索引联系。

毫无疑问,技术的演进提高了影视制作的效率与数字表演想象的可实现性。 Metaphysic的实时生成 AI换脸技术重现传奇摇滚巨星埃尔维斯的现场表演,实现《此心安处》中演员银幕形象的“跨龄”转变。虚拟演员能够应对电影工业生产流程中的意外,保护电影制作顺利进展、降低制作成本。事实上,算法生成的 AI演员不仅是对技术奇观的一种猎奇,更在与社会文化的互动中,牵引出关于艺术创作与资本逻辑、控制与反控制的文化想象。

## “赛博格明星”: AI演员的文化实践

在 AI技术全面渗透的数智化时代,当我们借杰拉蒂解读明星制的三条路径重申当下的 AI演员,会发现 AIGC虚拟演员继续并拓展着既往明星模式的观念,“赛博格明星”成为尝试置换并扮演真人演员功能的一次文化实践。

一是作为商品的明星。如果说在大制片厂时代的好莱坞,明星向观众做出承诺,充当能够满足受众特定期待的商品,那么 AI时代的数字演员,能够满足 IP资本化翻拍过程中无限贴近小说角色形象的受众心理需求,并为文化产品的民主化创作与自由化定制提供可能。

二是作为文本、符号的明星。传统明星不仅是肉身性的演员,更是由电影文本内外多种机制所共同造就的复杂文本,一方面是银幕上显现的表演文本,另一方面是在广泛的社会语境下,经由娱乐新闻、宣传物料、杂志、个人传记等多媒介文本的交互性交织所结构的产物。 AI演员不仅深度参与影视内容的制作与生产,也模拟真人演员的物料宣发与传播模式。无论是算法伪造的现场路透图、幕后花絮、探班日记等副宣物料,还是线上社交媒体账号的开设及其与粉丝的积极互动,诸多大众媒介机制所造就的复杂人设与情景体验,试图营造追星的沉浸感,将共享的电影经验、审美体验扩展到更为广泛的日常生活与公共话题,模糊了虚拟与现实的边界。

三是作为“欲念客体”的明星。从明星的消费角度,聚焦于明星与观者之间的关系,观者在凝视明星(Star-gazing)的愉悦感中寻求满足。随着技术门槛与创作成本的降低, AI演员作为欲望投射的产物,既能免于“塌房”之担忧,又有自由“捏造”之心理代偿。网络视频博主二创性转版《甄嬛传》,以华妃为原型的 AI生成角色“霸道版华君”引发网络热潮并被推至顶流,其背后潜藏着凝视的欲望纠结与权力结构的动态变迁。观众通过辨识 AI角色形象中的理想自我或欲望性的客体,实现欲望的感性表达,获得视觉愉悦与认同。

AI造星运动诞生于文化产业模式、影视商业策略与社会话语实践的交汇之处, AI演员正逐渐汇入文化工业流程并被主流娱乐所接纳。 Xicoia工作室不至于借助“DeepFame”人格引擎赋予角色故事背景,丰满个性来制造单个 AI明星,而是意图开拓出动态发展的数字宇宙“Tillyverse”。作为 AI驱动、实时演变的数字生态系统与叙事平台,“Tillyverse”聚焦 AI演员的矩阵开发,提供 AI角色与观众多元互动的沉浸体验。可以说, AI造星的狂欢背后是资本逻辑主导下情感经济的运作。情感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经济模式,能够在碎片化时间中即时提供情绪价值。受众与 AI演员达成的目光注视下闪烁着数字光晕,观众在技术奇观中捕获一种数字乐趣。

基于拟动现象,赛璐珞胶片电影创造了运动幻觉,一种超现实的图像流,这与无意识运动相匹配。然而在技术发展、演变过程中,数字电影的制作模式与观众观影接受模式发生变化,颠覆了既有想象图景。在制作

## “算法生成”: 虚拟演员的技术演进

从“真人表演”到“算法生成”,虚拟演员逐渐脱离物质索引性、数字索引性,走向无根基的数字表演实践。计算机成像技术(CGI)出现促进影像视觉生产方式的结构转变,电影中的数字演员作为一种奇特的技术形式被广泛应用。之后, CGI与动作捕捉技术、数字建模技术的协同结合能够捕捉面部微表情与肢体动作,塑造出情感化的数字角色。虽然失去了与现实世界的索引性,但在现代视觉主体的目光注视下闪烁着数字光晕,观众在技术奇观中捕获一种数字乐趣。

基于拟动现象,赛璐珞胶片电影创造了运动幻觉,一种超现实的图像流,这与无意识运动相匹配。然而在技术发展、演变过程中,数字电影的制作模式与观众观影接受模式发生变化,颠覆了既有想象图景。在制作

投注虽然满足了一定的情感需求,但这份情感代偿与过度迷恋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心理危机根源。电影《某种物质》中好莱坞巨星伊丽莎白出于对衰老的抗拒与完美自我的追求,服下“完美物质”后从本体分裂出青春靓丽的分身,在欲望模仿的力比多满足中,欲望主体与欲望介体的对抗性纠缠导致双双走向自毁之路;《未来学大会》的过气女星罗宾·怀特将个人的数字形象资产出售给公司,永远鲜活的虚拟形象不知疲倦地进入大众文化工业的生产与再生产循环中。前述科幻电影的悬疑幻想已然照进现实,阿里大文娱的 AI数字人厘厘出演《异人之下》的二壮、现身真人秀综艺《盒子中的猫》,北京经开区为 AI虚拟偶像 Yuri(尤栗)颁发身份认证,乐华娱乐推出 AI驱动真人女团 HeyDream, 津潇传媒官宣签约六位真人建模授权生成的 AI演员……这些不会“塌房”、不存在生理限制,能够承担复杂表演任务、适应高强度与长时间工作需求的虚拟偶像,在一定程度上契合着大众审美理想并构成了制片公司盈利的理想载体。

作为木乃伊“情意综”在赛博空间的延续, AI演员的数字生命在实现人们镌刻时间、以生抗死心理欲求和实现完满自我的原初自恋的同时,也滑向另一极的怪怖(Uncanny)先兆,挤压真人演员的生存空间并侵蚀个体权利。弗洛伊德认为怪怖效应常常萌发于陌生与熟悉、想象与现实的界限遭到抹除之时。当 AI演员这一象征符作为真人的复影与镜像,将其所象征之物的功能悉数收归己有后,开始反噬人类主体及其生命权力,从而卷入一场场虚拟入侵现实的舆论风暴,“男二以下 AI演员”话题冲上微博热搜,影视行业的演员们纷纷陷入被 AI演员蚕食的职业生涯与心理焦虑。表演权力的让渡不仅引起真人演员遭遇“ AI斩杀线”的职业焦虑,也触碰着伦理的边界。演员 Dewhurst 于 2021 年与科技公司 Synthesia 签署合同,提供其肖像权制作 AI虚拟化身,却在两年后发现 AI化身被用于委内瑞拉虚假新闻的报道。数字虚拟侵蚀物理现实,在似与非似、虚实难分之间泛起主体性焦虑与恐慌感。在人机关系中,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动态反转,印证了虚拟演员与真人演员之间支配与依赖关系的不确定状态。大众面对 AI演员涌现出神秘与恐怖、惊奇与压抑的情感,映射出一则媒介自反的寓言,人类制造 AI演员的意义并赋予其形状,但反而将人类自身的灵魂作为囚徒封锁其中。

我们不禁疑问, AI演员有情动面孔吗? 那些冰冷的像素矩阵、精确的算法模拟何以承载人类灵魂深处的感性触动? AI演员复现张曼玉在《甜蜜蜜》里的哭戏片段,能够呈现情绪变动,却难以抵达活生生人类的情感表现,未能根植于人类经验与生活阅历的演技,不过是空中楼阁。当下 AI演员能应付短剧的“速食”消费,却不能给予深度的生命经验,无法产生即兴创作的意外之美,何以经得起长剧检验? 当观众感知并与银幕上的虚拟人物互动时,一方面可能会沉迷于数字明星的完美性特征,进而被催眠。但另一方面,当观者意识到这只是虚拟世界的数字创造,一个数字化想象的非人图像,不老不死,剥离了“失落、创伤和死亡的象征秩序”,观者与虚拟银幕形象之间就会裂开一道沟壑。正如格蕾姆·特纳所言,虚拟明星没有真人明星的经历体验,不受母爱、俄狄浦斯式的焦虑、失落、狂喜、欲望、死亡等现实经验影响,也没有压抑的欲望或原始创伤。观众认识到虚拟明星只是一个在现实中没有参照的幻影,也因此不再产生移情和代入感,与银幕相疏远。

虚拟再造的 AI偶像往往具有后现代文化的特征,即平面化和无深度感, AI图像流的无缝感使其本身缺乏深度,如同塑料制品。 AI演员的同质化生产、工业化的复制,终究会使观众产生疲倦。数字生命化为技术操控下的原料,失去了肉身性联系,如何共情他人之痛苦? 唯有 AI演员与真人演员的协同并进,尊重真实生命个体的情感内核,才能在观演互动中获得灵魂的震荡与共鸣。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学系博士生)

技术狂欢下对虚拟形象的欲望